

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战略判断与发展建议*

□孙久文 张 静 李承璋 卢怡贤

摘要:本文基于我国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2015年和2018年贫困发生率、2013~2018年人均GDP、2015~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及2017年交通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连片特困区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较快,以贫困发生率衡量的贫困面快速收窄,各片区农村人均收入增速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本需求得到满足;2020年以后,按照现行标准,集中连片特困区将基本上消失,但人均GDP及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进一步拉大,相对贫困现象将成为需要瞄准的课题。建议:确立扶持相对贫困落后地区的国家战略,实施保障性扶贫与开发式扶贫共存的策略,并结合乡村振兴等战略措施实施对相对贫困地区的扶持。

关键词: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贫困发生率 相对贫困 人均可支配收入

一、引言

贫困地区的发展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建设包容性社会的必然要求。扶助贫困落后地区发展是世界性的区域发展课题,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扶贫的重要抓手和成功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打响了脱贫攻坚战。2013年,“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下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数据显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识别人口占全国的50%以上,因而成为我国精准扶贫的主战场。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扶贫日的讲话中,将2020年“精准扶贫”时间节点要完成的任务归结为3项:7071万人脱贫、592个贫困县摘帽和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其中,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主要是解决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脱贫问题。

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范围为: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区、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在实践中,新疆地区的扶贫地区逐渐扩展为南疆四地州。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2017》数据计算,这些片区覆盖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划面积达41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陆上区划面积的43%,涉及4900多个乡和5000多个镇,县域户籍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8%,贫困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0%左右,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6%。这样广袤的地域和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能否顺利脱贫直接影响我国精准扶贫能否完成任务,这些地区未来的发展也关系我国精准扶贫成果能否稳固。本文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问题:通过若干年的扶贫,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减贫成效如何?这些地区目前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情况,贫困深度与广度怎样了?连片特困区在地理范围上的成片现象有无变化?基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战略判断是什么,未来促进这些地区发展有何建议?

自2011年我国把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以来,关于连片特困地区的研究文

*衷心感谢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范小建老师的悉心指导。

章开始出现。至2019年8月13日,在CNKI期刊数据库中,以“‘连片特困’、‘连片贫困’、‘连片区’、‘片区县’”为篇名,在“期刊”数据库进行检索,文献共713篇,其中,CSSCI和中文核心期刊仅有296篇。已有的关于连片特困区的研究涉及的主题主要有:贫困识别(沈丹等,2019);贫困原因的分析(贾林瑞等,2018;田园等,2018;王志章、刘天元,2016);多维贫困(周常春等,2017;郑长德、单德朋,2016);脱贫路径与扶贫模式(陈艾、李雪萍,2015;刘筱红、张琳,2013;郑长德,2017;李博、左停,2017;银马华等,2018);经验总结与比较(张玉强、李祥,2017);政策效果评估(李绍平等,2018);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边慧敏等,2019);生态与文化建设(李民等,2017);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蒋辉,2012)。而目前涉及关于连片特困区主题的相关研究对基本情况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个别(梁晨霞等,2019)或几个连片贫困区,或某个领域,比如医疗卫生与教育(张志敏等,2018;丁波、李雪萍,2014)、交通(王武林等,2016)、科技扶贫(薛曜祖,2018)。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基于多维贫困的视角,从多个指标维度出发,全面展现“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的减贫情况;通过数据库和调研、检索,丰富了扶贫信息和研究数据;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在深度研究连片贫困地区减贫情况和存在的现实问题基础上,提供了我国由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的依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选择与方法

根据国家贫困县的确定标准、扶贫的主要目标和扶贫过程中的重点关切,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主要选择贫困发生率、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为主要分析指标,对我国集中连片贫困区的经济发展和减贫情况进行研究,并考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的提供及信息网络的重要性,对连片区情况进行了分析。其中,贫困发生率用农村贫困人口占全部农村人口的比重表示,是衡量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能否“摘帽”的首要指标。区域经济发展是地区实现脱贫和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源泉,也是实现贫困人口“就近就业”的基础,考虑到贫困县的面积和人口数量不同,本文以人均GDP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教育是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且阻断代际联系的重要保障(Song, 2012),交通设施(李志军, 2014)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而医疗服务是防止和救助因病致贫问题的重要措施(Gien et al., 2007)。此外,现代技术迅猛发展,信息与通讯基础设施与服务是避免贫困地区人口难以融入社会、无法接收外界信息与政策,以及防止闭塞导致缺失发展机会等贫困问题的重要保障(Pade et al., 2005),可以看作地区发展的多维能力建设的一部分。因而,本文选取了教育、医疗、交通及通信设施条件的指标,分析贫困地区多维发展能力建设的基础条件。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除文中特别指明外,本文所用年贫困发生率来自各县(市、区)政府工作报告及政府网站新闻;连片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水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县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及各县(市、区)的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统计公报及政府网站新闻;县域GDP、人口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县政府年度统计公报等资料。

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2013年和2014年各县对贫困发生情况进行了精准识别,但由于各地区最初精准识别工作的截止日期不同,又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因此本文对贫困发生率的分析从2015年开始。因统计指标调整,2013年和2014年县域收入中有些县(市)是纯收入有些为可支配收入,因而片区县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分析时间从2015年起。考虑人口数据的可得性,同时考虑贫困地区人口落户到其他地区从而获取福利的难度较大,最后还需要依靠本地经济的发展获益,本文在计算人均GDP时采用了户籍人口指标,因而人均GDP数据与各政府部门统计公报发布的数据有出入。数据缺失值一般用近5年的年均增长率进行估算,或者根据政府网站相关信息进行估算,数据缺失较多的西藏区和新疆四地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本文未予分析。

三、片区县减贫情况与趋势判断

(一)片区县经济综合实力变化

经过实施“精准扶贫”战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经济实力发生了很大变化。

1. 整体及分片区经济实力变化情况

从增长速度来看,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人均GDP的增速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如表1所示。片区总体上的年人均GDP增速在2013~2018年间为8.57%,同期全国年人均GDP增速为8.17%,片区整体上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

分片区来看,西藏区最高,年均增速为14.07%,高于全国5.91个百分点;其次为滇黔桂石漠化区,人均GDP增速为12.42%,高于全国水平4.25个百分点;四省藏区、燕山—太行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大别山区、南疆四地州和六盘山区的人均GDP增速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从人均GDP的数量变化来看,2018年片区整体上比2013年增加了7595元,增长50.9%。2013~2018年,8个片区的人均GDP增幅超过50%,西藏区变化最多,增加了1.77万元,增长93.2%(根据所用数据的特点,此数值偏大),其次是滇黔桂石漠化区,增加了1.03万元,增长79.5%。六盘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四省藏区和南疆四地州人均GDP增幅较低,分别为31.7%、17.5%、27.2%、25.1%和36.3%,其中,大兴安岭南麓山区人均GDP的绝对增量最小,为3318元,其次是六盘山区,5年增加了4340元,这些地区是扶贫攻坚和2020年之后需要重点关注的地区。

从人均GDP的数值看,连片贫困区仍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且绝对差距进一步拉大。2018年,12个片区中人均GDP最高的四省藏区的人均GDP仅为全国的58.3%。而且,从绝对数量来看,2018年各片区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除西藏区2018年与全国水平的差距比2013年的差距增长数量(0.33万元)小于1万元外,其余地区的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增量均超过了1万元。六盘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大别山区、四省藏区和南疆四地州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也进一步拉大,其中四省藏区和大兴安岭南麓山区人均GDP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重分别下降了11个百分点和9个百分点。其余片区的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缩小,其中西藏区人均GDP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重上升了13.2个百分点,滇黔桂石漠化区上升了6.3个百分点,其他片区仅上升1~2.6个百分点。

片区县人均经济规模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巨大。2018年,片区人均GDP最小值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2%,罗霄山区人均GDP最小值是所有片区最小值中最大的,但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4.7%。六盘山区和秦巴山区人均GDP最小值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

各片区县的发展差异较大,片区间与片区内部呈分化态势。2018年乌蒙山区人均GDP最低,为1.78万元,仅为最高片区四省藏区的47.4%,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7.7%。各片区人均GDP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倍数关系在3倍以上,分化最严重的四省藏区、六盘山区、罗霄山区和西藏区的人均GDP最大最小值相差10倍以上(见表2)。

2. 分县域经济实力变动情况

当前,片区县的人均GDP分布以1万~5万元最多,且由2013年的79.7%增加至2018年的89.7%,人均GDP低于1万元的比例已经由18.4%减少到4.6%。但人均GDP超过5万元的县域还很少,2018年仅有39个,比重为5.7%。若各县人均GDP能够保持2013~2018年的增长率,则到2025年将会有445个县的人均GDP可以达到1万~5万元,占全部片区县的64.6%,达到5万元以上的县将达到235个,占比34.1%(见表3)。

但是,片区县域人均GDP占全国的比重变化较小(见表4),2013~2018年,约

表1 2013~2018年我国14个连片贫困区人均GDP情况(单位:万元)

排名	片区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3~2018年年均增长率(%)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值	比较
1	四省藏区	3.01	2.94	2.99	3.24	3.37	3.76	4.59	-3.58
2	西藏区	1.90	2.12	2.39	2.76	3.28	3.66	14.07	5.91
3	罗霄山区	1.69	1.86	2.01	2.22	2.44	2.67	9.56	1.40
4	秦巴山区	1.65	1.82	1.94	2.12	2.38	2.60	9.47	1.30
5	滇西边山区	1.61	1.74	1.91	2.10	2.33	2.46	8.91	0.74
6	滇黔桂石漠化区	1.30	1.49	1.67	1.89	2.15	2.33	12.42	4.25
7	吕梁山区	1.53	1.65	1.55	1.67	2.01	2.33	8.69	0.52
8	武陵山区	1.42	1.59	1.74	1.92	2.11	2.24	9.49	1.32
9	燕山—太行山区	1.76	1.82	1.87	1.98	2.14	2.23	4.92	-3.24
10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1.89	2.00	2.13	2.20	2.22	2.22	3.28	-4.88
11	大别山区	1.34	1.46	1.54	1.67	1.82	1.97	8.01	-0.15
12	南疆四地州	1.43	1.57	1.74	1.66	1.85	1.95	6.39	-1.78
13	六盘山区	1.37	1.52	1.54	1.64	1.69	1.80	5.66	-2.50
14	乌蒙山区	1.16	1.28	1.39	1.52	1.69	1.78	9.00	0.83
	总体情况	1.49	1.64	1.75	1.91	2.10	2.25	8.57	0.41
	全国平均水平	4.36	4.69	4.99	5.35	5.90	6.45	8.17	—
	片区占比(%)	34.26	34.88	35.10	35.60	35.51	34.91	—	—

注:(1)排序标准:2018年人均GDP;(2)比较列数值=片区年均增长率-全国2013~2018年年均增速(8.17%);(3)部分数值因保留小数位的原因与显示的数据计算值略有不同。

80%(除2017年该比例为79.68%外)以上的县域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45%和20%左右的县域人均GDP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3和1/4,这说明,尽管这些年绝对贫困的情况不断改善,但相对全国水平,片区县的相对落后状态并没有得到改善。

部分片区县的经济增长较缓慢。如表5所示,2013~2018年,57.3%的片区县人均GDP增长率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17%),但有38个(占比5.52%)片区县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小于1%,还有156个片区县(占比22.6%)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小于6%。

(二)片区县居民收入情况

1. 整体及分片区收入与消费情况

从增长速度看,如表6所示,2013~2018年,14个片区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所有片区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均超过了10%。其中,南疆四地州增速最高,达到16%。2018年,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260元,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70.2%,比2013年提高0.7个百分点。分片区看,六盘山区人均收入最低,仅为全国的57.9%,吕梁山区倒数第二,为全国的58.7%。南疆四地州最高,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1.9%,其次是大别山区,占全国的81.5%。秦巴山区、武陵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罗霄山区和西藏区占全国比重在70%~80%之间;其余片区农村人均收入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0%~70%。

2013~2018年,连片特困区全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全国水平的比例不断提升,表明两者之间的相对差距缩小,其中乌蒙山区、罗霄山区和南疆四地州的比重变化超过10个百分点。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全国比重增幅最大的是南疆四地州,从2013年占全国的60.4%上升到2018年的81.9%,上升了21.5个百分点,数值比2013年增长了110.4%。变化最小的是吕梁山区,从2013年占全国的55.8%上升到58.7%,仅上升3个百分点,比2013年的5259元增长了63.2%。

但片区农村人均收入与全国的绝对差距仍在不断扩大,2018年比2013年的差值增大了883元。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仅有南疆四地州是减小的(差距下降了1096元),其余片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均进一步拉大,尤其是六盘山区、滇西边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和四省藏区6个片区,2018年农村人均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比2013年均增大了1000元以上。

片区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较小,片

表2 2013~2018年各片区人均GDP情况(单位:元)

片区名称	项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六盘山区	最大值	69684	74382	73812	81402	92489	135253
	最小值	3619	4499	4675	4994	5476	5260
	倍数	19.26	16.53	15.79	16.30	16.89	25.71
秦巴山区	最大值	42629	41487	44487	47887	53712	56907
	最小值	4644	5394	5754	6135	5357	6172
	倍数	9.18	7.69	7.73	7.81	10.03	9.22
武陵山区	最大值	30573	35426	39914	44088	49869	55313
	最小值	6711	9190	10614	11292	12109	12718
	倍数	4.56	3.85	3.76	3.90	4.12	4.35
乌蒙山区	最大值	21817	23141	26608	30415	34967	36554
	最小值	6221	5390	5787	6307	6965	7245
	倍数	3.51	4.29	4.60	4.82	5.02	5.05
滇桂黔石漠化区	最大值	26174	30695	33933	40742	48624	51605
	最小值	4764	4998	5623	6190	6769	6810
	倍数	5.49	6.14	6.04	6.58	7.18	7.58
滇西边山区	最大值	27987	27875	29004	32604	39327	36336
	最小值	7264	8188	9209	10200	11393	12127
	倍数	3.85	3.40	3.15	3.20	3.45	3.00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最大值	46404	47373	49832	49124	52444	54030
	最小值	9336	10498	11350	12018	13980	15286
	倍数	4.97	4.51	4.39	4.09	3.75	3.53
燕山—太行山区	最大值	28998	30862	32434	34757	36921	39219
	最小值	8587	9326	9598	10447	11510	11771
	倍数	3.38	3.31	3.38	3.33	3.21	3.33
吕梁山区	最大值	32754	36277	30744	31971	40647	49853
	最小值	6198	6826	6361	6418	7997	8917
	倍数	5.28	5.31	4.83	4.98	5.08	5.59
大别山区	最大值	24711	27447	29525	32005	34500	37935
	最小值	5530	6043	6798	7544	8298	9198
	倍数	4.47	4.54	4.34	4.24	4.16	4.12
罗霄山区	最大值	165548	179361	189385	209105	239571	267986
	最小值	10417	11426	12545	13532	14988	15922
	倍数	15.89	15.70	15.10	15.45	15.98	16.83
西藏区	最大值	98498	113477	127475	145019	164978	187683
	最小值	6824	7794	9019	10177	11249	11677
	倍数	14.43	14.56	14.13	14.25	14.67	16.07
四省藏区	最大值	415421	402071	256914	355134	387176	552444
	最小值	5752	6590	6378	7090	7376	8206
	倍数	72.22	61.01	40.28	50.09	52.49	67.32
南疆四地州	最大值	28456	31383	34430	32820	49860	53936
	最小值	5138	5865	6675	6738	7782	8113
	倍数	5.54	5.35	5.16	4.87	6.41	6.65
片区整体情况	最大值	415421	402071	256914	355134	387176	552444
	最小值	3619	4499	4675	4994	5357	5260
	倍数	114.80	89.37	54.96	71.12	72.28	105.03

注:本表中四省藏区数据按照户籍人口计算。

表3 2013~2018年片区各县人均GDP分布(单位:个)

收入分级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5万元以上	13	16	18	25	30	39
1万~5万元	549	587	612	624	619	618
1万元以下	127	86	59	40	40	32
合计	689	689	689	689	689	689

注:“单位:个”指片区县的个数,本文下同。

表4 片区县人均GDP小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个数(单位:个)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小于全国	670	670	671	672	670	670
小于全国1/2	561	556	557	553	549	559
小于全国1/3	341	325	311	298	303	313
小于全国1/4	172	160	142	133	132	152
小于全国1/10	2	1	2	1	3	3

区内部的最大最小值倍数在 1.2~3.65 区间内。片区间的收入差异相对大些,582 个片区县的收入最大值为最小值的 5 倍多。

从消费情况看(见表 7),一方面,连片特困区人均消费支出上升,消费占收入的比重下降。消费方面,2017 年连片特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7915 元,是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的 72.3%,比 2013 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占片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重为 85.4%,比 2013 年降低 4.9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除食品外的其余支出比重升高。除“食品烟酒”外,连片特困区各项人均消费支出数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均缩小,说明连片特困区居民有更多的资金能够购买更多食品以外的产品。食品烟酒产品消费支出所占比重由 2014 年的 37.4% 下降到 2017 年的 34%。虽然贫困地区农村居民食品支出减少可能与受政府与社会在食品方面的补助或捐赠有关,但因其他各支出均有较大水平的提升,所以基本可判定特困地区人均收入已经不属于恩格尔系数所指示的贫困类别。

2. 分县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收入方面,如表 8 所示,从 2015 年至 2018 年,低收入县域数量减少,中、高收入的县域数量增加,超过一半的片区县收入大于 1 万元。到 2018 年,仅有 4 个县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5000 元以下,分别为吕梁山区临汾市的大宁县、永和县、汾西县和吕梁市的石楼县,此外,吕梁山区的吉县、兴县、临县、岚县和六盘山区的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收入也较低,低于 6000 元。

集中连片贫困的农村人均收入较高的县多来自四省藏区,较低的主要来自吕梁地区。2018 年农村人均收入末 10 名中有 9 名来自吕梁山区、2 名来自六盘山区,除上述低于 6000 元的 9 个片区县外,还有六盘山区的东乡族自治县。

按照 2013~2018 年的年均增长率,预计到 2020 年,将有 487 个县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1 万元,占统计片区县的

表 5 2013~2018 年 12 个片区县域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情况(单位:个)

片区名称	增长率 <1%	1%≤增长率 <2%	2%≤增长率 <3%	3%≤增长率 <6%	6%≤增长率 <8.17%	增长率 ≥8.17%
六盘山区	9	2	4	8	18	20
秦巴山区	0	1	1	8	14	51
武陵山区	1	0	1	5	16	41
乌蒙山区	2	2	0	7	12	15
滇桂黔石漠化区	0	0	0	3	8	69
滇西边境山区	0	0	0	5	14	37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4	1	2	7	3	2
燕山—太行山区	4	3	2	8	8	8
吕梁山区	0	0	1	3	2	14
大别山区	0	1	0	2	16	17
罗霄山区	0	0	0	1	1	21
西藏区	6	1	1	4	8	54
四省藏区	10	2	3	18	12	32
新疆四地州	2	1	1	9	6	14
合计	38	14	16	88	138	395

表 6 2013~2018 年连片特困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单位:元)

片区名称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年均增速(%)
全部片区	5956	6724	7525	8348	9264	10260	11.5
六盘山区	4930	5616	6371	6915	7593	8459	11.4
秦巴山区	6219	7055	7967	8769	9721	10869	11.8
武陵山区	6084	6743	7579	8504	9384	10458	11.4
乌蒙山区	5238	6114	6992	7994	8776	9985	13.8
滇桂黔石漠化区	5907	6640	7485	8212	9109	10151	11.4
滇西边境山区	5775	6471	6943	7754	8629	9540	10.6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6244	6801	7484	8399	9346	10338	10.6
燕山—太行山区	5680	6260	7164	7906	8593	9530	10.9
吕梁山区	5259	5589	6317	6884	7782	8583	10.3
大别山区	7201	8241	9029	9804	10776	11919	10.6
罗霄山区	5987	6776	7700	8579	9598	10800	12.5
西藏区	6553	7359	8244	9094	10330	11575	12.1
四省藏区	4962	5726	6457	7288	8018	9040	12.7
新疆新疆四地州	5692	6403	7053	7868	9845	11975	16.0
全国	9430	10489	11422	12363	13432	14617	9.2
全国一片区	3474	3765	3897	4015	4168	4357	4.6
片区/全国	0.632	0.641	0.659	0.675	0.690	0.702	1.254

资料来源:2013~2017 年集中连片特困区数据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全国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18 年收入数据为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表 7 连片特困地区与全国农村消费水平和结构对比

项目	2017 年连片特困地区人均消费支出(元)	2017 年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元)	2014 年全国一连续片特困地区(元)	2017 年全国一连续片特困地区(元)	2014 年连片特困地区相当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2017 年连片特困地区相当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人均消费支出	7915	10955	2485	3040	70.4	72.3
食品烟酒	2693	3415	609	722	78.4	78.9
衣着	443	612	152	169	70.2	72.4
居住	1668	2354	544	686	69.1	70.9
生活用品及服务	486	634	132	148	73.9	76.7
交通通信	918	1509	418	591	58.7	60.8
教育文化娱乐	878	1171	285	293	66.9	75.0
医疗保健	696	1059	277	363	63.3	65.7
其他用品和服务	134	201	67	67	58.9	66.7

表 8 片区县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布(单位:个)

收入分级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20 年(预测值)
大于 1 万元	27	69	165	314	487
5 千~1 万元	533	502	411	264	93
5 千元以下	22	11	6	4	2
合计	582	582	582	582	582

注:不包括西藏区和新疆四地州。

84%,也有63个县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5万元,个别县将超过2万元。

但是,2015~2018年,片区县农村居民收入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重变化较小,98%以上的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2018年,在12个片区(不包括西藏和南疆四地州)的582个片区县中,仍有41.24%的县农村居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且有比重约8%的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县域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分布如表9所示。2013~2018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2%)的共计164个片区县,占比(除西藏区和南疆四地州外的片区数量)达到28%。这意味着,未来这些县的农村居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持续拉大,相对贫困程度将增加。

(三)贫困发生率变化情况

1. 整体及分片区贫困发生率

贫困发生率是衡量一个地区贫困发生广度的重要标准,也是划定国家级贫困县和深度贫困县的重要指标。贫困县摘帽的标准之一,就是要求贫困发生率在中部地区降到2%以下,西部地区降到3%以下。自2014年中央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各集中连片特困区(下称“片区”)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发生率同时大幅度下降。

从2013年至2018年,全部片区的贫困人口从4141万下降到935万,年均减少25.7%,略低于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27.4%),贫困人口占全国比重从约50%上升到56.3%。各片区县方面,2013~2018年:(1)贫困人口数减少最多的是秦巴山区,从559万减少到101万,减少458万,下降了81.9%;滇黔桂石漠化区从574万减少到140万,减少了434万,下降了75.6%;武陵山区从543万减少到111万,减少了432万,下降了79.6%。(2)贫困人口数减少数量较少,但减少比例较大;西藏区从72万减少到13万,减少了59万,下降了81.9%;吕梁山区从76万减少到16万,减少了60万,下降了78.9%;大兴安岭南麓山区从85万减少到19万,减少66万,下降了77.6%。

在贫困人口减少的同时,贫困发生率的下降也比较显著(见表10)。全部片区的贫困发生率从2013年的20%下降到2018年的4.5%,下降15.5个百分点。西藏区和四省藏区的下降幅度比较大,分别是23.7个百分点和22个百分点;其次是乌蒙片区,下降19个百分点。所有片区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均大于12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大于15.5个百分点的还有吕梁山区(17.1个百分点)、六盘山区(18.5个百分点)、滇黔桂石漠化区(16.6个百分点)和秦巴山区(15.9个百分点)。

2. 分片区县贫困发生率的变动情况

近年来,我国的贫困状况有了根本性的好转。根据2019年6月以前的审核情况,截至2018年,连片特困区已有417个县的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以下,317个连片县已经摘帽,占全国的72.7%。其中,2016年15个连片县“摘帽”,2017年分第一、第二批分别有29个和70个连片县“摘帽”,2018年有203个摘帽,如表11所示。

片区县的贫困发生率的分布变化很大,如表12所示。2015~2018年,县域贫困发生率分布最多的区间,已经从10%~19.99%下降到0~2.99%。2015年,贫困发生

表9 2013~2018年片区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分布(单位:个)

片区名称	增长率<3%	3%≤增长率<6%	6%≤增长率<9.2%	增长率≥9.2%
六盘山区	0	0	46	15
秦巴山区	1	4	28	42
武陵山区	0	0	3	61
乌蒙山区	1	0	3	34
滇黔桂石漠化区	1	3	3	73
滇西边境山区	0	0	4	52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1	1	2	15
燕山—太行山区	0	0	10	23
吕梁山区	0	5	8	7
大别山区	0	3	16	17
罗霄山区	0	0	1	22
四省藏区	1	1	18	57
合计	5	17	142	418

注: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南疆四地州。

表10 2013~2018年14个片区贫困发生率(单位:%)

片区名称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六盘山区	24.1	19.2	16.2	12.4	8.8	5.6
秦巴山区	19.5	16.4	12.3	9.1	6.1	3.6
武陵山区	18.0	16.9	12.9	9.7	6.4	3.8
乌蒙山区	25.2	21.5	18.5	13.5	9.9	6.2
滇黔桂石漠化区	21.9	18.5	15.1	11.9	8.4	5.3
滇西边境山区	20.5	19.1	15.5	12.2	9.3	5.8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16.6	14.0	11.1	8.7	6.6	3.5
燕山—太行山区	17.9	16.8	13.5	11.0	7.9	4.5
吕梁山区	21.7	19.5	16.4	13.4	8.4	4.6
大别山区	15.2	12.0	10.4	7.6	5.3	3.0
罗霄山区	15.6	14.3	10.4	7.5	5.0	3.2
西藏区	28.8	23.7	18.6	13.2	7.9	5.1
四省藏区	27.6	24.2	16.5	12.7	9.5	5.6
南疆四地州	20.0	18.8	15.7	12.7	9.1	5.9
全部片区	20.0	17.1	13.9	10.5	7.4	4.5

资料来源:2013~2017年数据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8年数据根据地区数据测算。

公共管理

率在10%~19.9%之间的县域数量占片区县的比重最大,达到44.4%,到2018年已经下降到8.9%,下降了35.6个百分点。2015年,仅有4个片区存在贫困发生率低于3%的县,而2018年贫困发生率符合“摘帽”标准,即贫困发生率在3%以下的片区县比重达到60.5%(见表12),且其中76%的县已经“摘帽”,剩余100个贫困县为“摘帽”的窗口县。

从贫困发生率的下降速度来看,2015~2018年,14个连片特困区共有446个县的减贫幅度大于10个百分点(见表13)。除罗霄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外,其余地区均有减贫幅度超过20个百分点的片区县,合计共110个,占全部片区县的15.82%。片区县数量最多的减贫幅度是10%~20%的区间,占比为48.91%。

按照当前标准,贫困发生率大于10%的片区县还有76个,其中15个县高于20%。大兴安岭南麓山区、大别山区和罗霄山区已经没有贫困发生率10%以上的片区县;其他分布是:滇黔桂石漠化区(16个)最多,其次分别为秦巴山区(11个)、乌蒙山区(11个)、滇西边境山区(11个)、西藏区(10个)、南疆四地州(8个)、六盘山区(3个)、武陵山区(2个)、燕山—太行山区(2个)、吕梁山区(1个)、四省藏区(1个)。其中,深度贫困片区县仅剩24个,主要分布在南疆四地州(8个)、乌蒙山区(5个)、滇西边境山区(5个)、西藏区(4个)和秦巴山区(2个),主要分布在生存条件比较恶劣、自然灾害多发或边远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人均公共服务成本高,地理环境与位置都非常不利于经济发展。

按照当前标准,贫困发生率处于3%~10%的片区县还比较多,共计196个县,占全部片区县的28.4%。这些片区县应当是2019年贫困县摘帽的重点工作地区。其中,大兴安岭南麓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还有少量贫困县分布在这个档位,这些地区的其余片区县贫困发生率已经下降到3%以下,而这些地区有可能在2019年就能实现全面“摘帽”。

3.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变化趋势判断

如果我们以10%的贫困发生率为判断标准,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1)从大于10%的角度看,在大兴安岭南麓山区、大别山区和罗霄山区,原来的集中连片特困区已经不存在了;(2)在六盘山区(3个)、武陵山区(2个)、燕山—太行山区(2个)、吕梁山区(1个)和四省藏区(1个)只有极少量贫困县贫困发生率大于10%,但已不能形成大面积的片区;(3)只有在秦巴山区(11个)、乌蒙山区(11个)、滇黔桂石漠化区(16个)、滇西边境山区(11个)、西藏区(10个)和南疆四地州(8个)还明显存在连片区,但仅西藏区、滇黔桂石漠化区和南疆四地州在大于10%的贫困发生率的标识下仍然能够连成一片。预计到2020年,大部分“集中连片特困区”在空间上消失,这将是精准扶贫战略的重大成果,也预示到2020年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指日可待。所以,到2020年在政策上可以取消“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称谓和存在。

由于西藏区、南疆四地州、四省藏区(包括凉山州)、六盘山区(包括临夏州)、滇西区(包括怒江州)与深度贫困地区(即“三区三州”)基本上重合,届时可以用“深度贫困区”来特指这几个地区。

(四)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良好的交通条件是区域发展的首要前提,也是促进贫困地

表11 片区县“摘帽”情况(单位:个)

片区名称	已“摘帽”			未“摘帽”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六盘山区	0	5	13	43
秦巴山区	0	7	17	51
武陵山区	4	8	19	33
乌蒙山区	1	5	4	28
滇黔桂石漠化区	0	7	22	51
滇西边境山区	0	13	22	21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0	3	9	7
燕山—太行山区	1	2	10	20
吕梁山区	0	2	8	10
大别山区	0	5	19	12
罗霄山区	0	6	11	6
西藏区	5	25	25	19
四省藏区	3	11	21	42
南疆四地州	1	0	3	29
合计	15	99	203	372

表12 2015、2018年不同程度贫困发生率的分布数量(单位:个)

贫困发生率分布区间	2015年	2018年
40%及以上	5	0
30%~39.9%	51	3
20%~29.9%	190	12
10%~19.9%	306	61
3%~9.9%	127	196
0~2.99%	10	417
合计	689	689

表13 2015~2018年贫困发生率减幅(单位:个)

片区名称	20% ≤ 减幅 < 50%	10% ≤ 减幅 < 20%	0 ≤ 减幅 < 10%	合计(%)
六盘山区	1	38	22	61
秦巴山区	6	28	41	75
武陵山区	2	39	23	64
乌蒙山区	4	15	19	38
滇黔桂石漠化区	11	53	16	80
滇西边境山区	3	24	29	56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0	0	19	19
燕山—太行山区	6	21	6	33
吕梁山区	7	8	5	20
大别山区	1	12	23	36
罗霄山区	0	10	13	23
西藏区	37	33	4	74
四省藏区	13	45	19	77
南疆四地州	18	11	4	33
合计	109	337	243	689

区发展的基本要求。近些年来国家对贫困地区尤其是连片特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不断增加。根据《中国交通年鉴(2017)》,仅2016年,连片特困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农村公路的固定资产投资就达到3611.6亿元,占全部扶贫重点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少数民族县(不含西藏)、边境县(不含西藏)、革命老区)的53.9%。截至2017年,除秦巴山区、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区和四省藏区外,其他10个片区所在自然村通公路的农户比重均达到了100%,交通的畅通性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而公共交通便利情况还较弱,自然村能便利乘坐公共汽车的农户比例偏低,四省藏区甚至还不到50%(见表14)。

信息化是制约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网络设施是贫困地区获取外界信息和开拓市场的关键途径。近些年,连片特困区的信息扶贫投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有限电视信号方面,2017年所在自然村能接收有线电视信号的农户比重除西藏区和四省藏区分别为77%和85.7%以外,其余片区均达到90%以上,14个片区整体上达到96.3%,其中大兴安岭南麓山区和吕梁山区已达到100%。网络宽带服务方面,2017年除西藏区、四省藏区之外,其他自然村通宽带的农户比重超过了70%。连片区所在自然村能通宽带的农户比重整体达到85.6%,比2015年提高了15.6个百分点。可以看出,目前连片区基本可以保证自然村与外界的信息沟通,但农户使用网络的便利程度和普及度仍有待提升。

在贫困救助过程中,医疗和教育是对减贫有重要作用的公共服务。2016年连片特困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90万张,比2011年增长了69.8%;2017年,14个片区整体上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的农户比重达到92.2%,除西藏区外,其余片区均达到80%以上。教育方面,我国扶贫政策历来重视教育提高贫困人口发展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一直强调教育在扶贫中的重要地位,在扶贫过程中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2016年各片区所属自然村上小学便利的农户比重达到60%以上,2017年连片区整体上达到88%,为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仍然存在较多上小学不便利的自然村,尤其是吕梁山区所属自然村上小学便利的农户比重仅为58.8%。根据实地调研情况,贫困人口的教育还面临身体条件不适合学习、失学人口超龄、失学人心理上对学习的抵触等情况,控辍保学率不稳定。

四、连片特困地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2020年目标实现及存在问题

根据前述分析,我国2011年划定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经过“精准扶贫”和区域性扶贫,绝大多数地区已经摆脱了绝对贫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已经不再存在。我国到2020年实现脱贫的目标指日可待。

从实地调研和前述分析看,当前和2020年后,扶贫过程中还将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有些地区仍然存在交通通信基础设施落后、基本医疗服务不能满足需要、上学不便利、住房安全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即便这些问题在一些地区得到基本解决,也存在效果的稳固问题,比如教育扶贫方面,很多地区的控辍保学率已经达到95%以上,但保学率并不稳定。另外,存在诸如失学人超龄、贫困人口生理心理原因不适于学习等细分问题。

第二,因地理因素和社会环境带来较大的刚性制约问题。贫困地区大多分布在生存条件比较恶劣、自然灾害多发或边远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面临气候、生态环境、地质地貌等自然条件制约,如西藏和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地区,基本上分布在青藏高原、南疆沙漠、横断山脉、黄土

表14 2017年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情况(单位:%)

片区	A1	A2	A3	A4	A5	A6	A7
全国贫困区	99.9	65.7	99.8	87.4	88.0	84.7	92.2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99.9	65.7	99.9	85.6	88.0	84.7	91.3
六盘山区	100.0	84.2	100.0	85.3	90.9	83.6	96.2
秦巴山区	99.9	67.5	99.7	87.3	85.3	81.9	95.2
武陵山区	100.0	62.7	100.0	80.4	81.1	80.9	91.4
乌蒙山区	99.8	53.2	100.0	72.7	92.1	86.4	86.3
滇黔桂石漠化区	99.9	55.4	99.8	86.2	90.7	83.4	89.8
滇西边境山区	100.0	51.2	100.0	83.8	85.0	78.9	88.7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100.0	90.4	100.0	94.3	87.7	82.3	95.9
燕山一太行山区	100.0	86.7	99.7	92.8	82.1	86.0	96.2
吕梁山区	100.0	82.6	100.0	76.2	58.8	63.5	81.8
大别山区	100.0	66.6	100.0	95.4	95.7	93.4	90.5
罗霄山区	100.0	67.3	100.0	96.0	91.7	90.6	89.0
西藏区	100.0	51.0	99.0	27.1	95.1	90.2	73.0
四省藏区	96.7	48.1	96.6	59.7	78.8	73.6	82.8
南疆四地州	100.0	73.7	100.0	98.1	97.2	98.6	95.1

注:A1表示所在自然村通公路的农户比重;A2表示所在自然村能便利乘坐公共汽车的农户比重;A3表示所在自然村通电话的农户比重;A4表示所在自然村通宽带的农户比重;A5表示所在自然村上小学便利的农户比重;A6表示所在自然村上幼儿园便利的农户比重;A7表示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的农户比重。

公共管理

高原等条件恶劣、灾害频繁的地区。海拔过高、干旱缺水的困难短期内难以克服。同时,由于很多片区县人口较少,土地面积广大、地貌复杂,基础设施造价高、维护成本高且受益面较小。

第三,产业扶贫方面也存在产业项目的续存和发展问题。贫困地区所覆盖的州县在全国区域发展的排名中均处于末端。区位、交通、地理、市场等条件限制下,产业发展困难。产业扶贫项目亏损较多,有些地区的“扶贫工厂”、“扶贫车间”甚至处于完全停业状态。这些问题一方面浪费了扶贫资金,另一方面对扶贫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也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一些地区面临教育和社会文明发展滞后的问题。一些深度贫困地区农村教育和生活环境不佳,农村教师引进困难、流失严重。农民或牧民的家庭收入微薄,受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农村女孩受教育机会偏少。有的地区文明法治意识淡薄,沿袭陈规陋习。

第五,贫困人口迁移带来的研究课题。很多贫困县的户籍人口数量大于常住人口数量,贫困人口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打工,这客观上形成了因贫困人口的迁移而带来的研究城市贫困问题从而城乡统筹扶贫的必要性。

(二)2020年后从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

2020年后,伴随绝对贫困地区消失,大量的相对贫困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扶贫开发的主要战场。2020年后中国扶贫开发将进入新的时期: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从主要解决收入贫困向解决多维贫困转变,从以农村为主向城乡统筹扶贫转变,从注重脱贫速度向注重脱贫质量和人民获得感转变。

相对贫困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存在的社会现象,这是分配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缓解相对贫困,调节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群体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新时代扶贫事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相对贫困、城市贫困、城乡统筹扶贫成为2020年后扶贫的关键词。

相对贫困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以相对贫困为着力点是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形态、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多维贫困以个体生活质量、发展能力等为依据对贫困户进行识别与帮扶,是摆脱贫困陷阱、提高扶贫质量的重要手段。城乡统筹扶贫将面临更为多元的贫困人口类别和更为复杂的致贫原因,是增强人民获得感、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三)2020年后缓解相对贫困的几点建议

1. 建立扶持相对贫困落后地区发展的国家战略

根据分析,即便贫困县已经逐步“摘帽”,多数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关系仍然没有改变,很多片区县仍然是相对贫困地区。未来,在精准扶贫任务结束后,这些地区的发展仍然需要国家扶持。因而,实施缓解相对贫困的扶助政策,建立扶持相对贫困地区发展的机制势在必行。可借鉴欧盟、美国等经济体对落后地区扶持发展的政策,根据我国的扶贫工作经验和实际情况,成立专门同时负责贫困落后地区发展和贫困人口发展的机构,坚持实行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定期识别监测相对落后贫困地区的发展情况,确保相对贫困落后地区的发展。在针对贫困县的贫困人口扶助方面,实行这一专门机构协调和考核等,必要时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重要性,对贫困落后地区给予重点援助。

2. 结合其他发展策略战略,实行多重政策扶持

贫困地区的发展除依托自身力量和扶贫政策外,还可以借助国家相关的政策,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部分地区由于很多自然条件带来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例如海拔高度),或者短期很难克服的(例如干旱缺水),解决扶贫工作困难的办法就需要开拓思路,从大扶贫的深度和广度去探索新的路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水利工程建设需要纳入大区域的经济发展规划。建议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也充分考虑扶贫的要求。

此外,乡村振兴与当前的农村扶贫都以农村人口的发展和收入提升为基础,但乡村振兴的内涵和标准更高。当农村由绝对贫困转入相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的策略就可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根据乡村振兴的不同模式和不同形态,贫困地区也可以选择与自身条件相适合的乡村振兴发展道路,依托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

3. 建立多方共同参与的扶贫机制

鉴于政府资源与力量的有限性,鼓励通过税收减免或优惠、机会准入、名誉奖励等方式,吸引社会组织、党群社团、企业、个人等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事业中来。加强社会组织的监管,建立社会各界通过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信心。形成“政府+机构+个人”多方参与扶贫机制,通过创业脱贫、就业脱贫、消费帮扶、精神扶贫、社保兜底脱贫、个人“一对一”、企业援助、地区援助等多种形式促进相对贫困地区和个人的发展。建议政府政策部门及时编制扶贫成功案例,在扶贫系统中传阅,一方面为中国的扶贫政策和扶贫理论研究提供基础资料,另一方面及时引导开拓地区扶贫思路和方式方法。

4. 实施保障性扶贫与开发式扶贫共存的策略

根据能否参与社会生产活动,贫困人口可分为基本不能参与生产活动、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生产活动和完全能够参与生产活动3种类型。其中,不能参与生产活动的主要有:老年人、残疾人、长期患病者和精神障碍者等人群。对这部分人群和仅有部分参与生产能力的人群应以提供社会保障为主,按照社保兜底的政策,保证其每年不低于贫困线的收入水平,不再为其提供发展生产的资金支持,即对这类人群进行保障性扶贫,从而实施保障性与开发式扶贫共存的扶贫策略。

开发式扶贫过程中要注意所选方式方法与地区发展环境和市场相匹配的方式,比如,在产业扶贫项目的选择过程中,应重点考虑随着现代分工体系的不断深化、制造业领域分化出来的一些不需要太多劳动技能和生产设备且原料和成品运输成本不高的生产环节和产品。

5. 有效利用新兴技术手段创新扶持办法

大力发展网络公共教育课程,聚集各类院校、社会福利机构、企业等组织乃至社会志愿者等的力量,面向贫困人口建立一套农业、工业、服务、技术培训、经济社会法律基本常识、人际交往实操培训等的网络课程,为不方便进入实体教育机构学习的贫困人口提供就学机会。网络课程设置奖学金、就业培训机会及就业通道,吸引贫困人口参与。设立超龄失学人口教育基金,对那些已经超龄的外出务工贫困人口就近学习或网络学习提供便利。针对社会文明落后的地区,通过微电影、微宣传片、政府政策引导等方式,降低贫困地区婚丧嫁娶讲排场及重男轻女等观念的影响。针对部分地区建立医疗机构困难,相应的医疗设施难以配备齐全的特点,建议试行为贫困地区人口看病提供交通补偿代替就近建立配套齐全的医疗机构,而就近仅设置一些急救机构、智能急救站的办法,降低医疗运行费用的同时又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随着网络诊疗技术的发展,可在贫困地区引入网上诊疗服务。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研究所。责任编辑:李逸飞)

参考文献

- (1) 边慧敏、张玮、徐雷:《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研究》,《农村经济》,2019年第4期。
- (2) 陈艾、李雪萍:《新发展主义视域下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路径探索》,《江汉论坛》,2015年第10期。
- (3) 丁波、李雪萍:《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以武陵山区为例》,《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 (4) 贾林瑞、刘彦随、刘继来、李进涛:《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户致贫原因诊断及帮扶需求分析》,《人文地理》,2018年第1期。
- (5) 李博、左停:《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购买服务式”综合性扶贫治理模式研究——以陕南秦巴山区“公益岗位”为例》,《农业经济问题》,2017年第2期。
- (6) 李民、谢炳庚、刘春腊、邓楚雄:《生态与文化协同发展助推长江经济带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思路与对策——以湘西州为例》,《经济地理》,2017年第10期。
- (7) 李绍平、李帆、董永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减贫政策效应评估:基于PSM-DID方法的检验》,《改革》,2018年第12期。
- (8) 李志军:《国外公共政策评估手册与范本选编》,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
- (9) 梁晨霞、王艳慧、徐海涛、齐文平、程序、赵文吉:《贫困村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以乌蒙山连片特困区为例》,《地理研究》,2019年第6期。
- (10) 刘筱红、张琳:《连片特困地区扶贫中的跨域治理路径研究》,《中州学刊》,2013年第4期。
- (11) 沈丹、周亮、王培安:《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六盘山连片特困区贫困度识别》,《国土资源遥感》,2019年第2期。
- (12) 田园、蒋轩、王铮:《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成因的地理学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 (13) 王武林、黄晓燕、曹小曙:《1980~2010年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公路可达性演化研究》,《地理科学》,2016年第1期。
- (14) 王志章、刘天元:《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内生原因与破解路径》,《农村经济》,2016年第5期。
- (15) 薛曜祖:《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科技扶贫的实施效果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下转第185页)

- (23) Romanelli, E. & Tushman, M. L., 1994,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as Punctuated Equilibrium: An Empirical Tes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37(5), pp. 1141~1166.
- (24) Rothmann, W. & Koch, J., 2014, "Creativity in Strategic Lock-ins: The Newspaper Industry and the Digital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83, pp. 66~83.
- (25) Schreyögg, G. & Sydow, J., 2011, "Organizational Path Dependence: A Process View",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 32(3), pp. 321~335.
- (26) Schreyögg, G. & Kliesch-Eberl, M., 2007, "How Dynamic can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be? Towards a Dual-Process Model of Capability Dynamiz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28, pp. 913~933.
- (27) Siggelkow, N., 2001, "Change in the Presence of Fit: The Rise, the Fall, and the Renaissance of Liz Claiborn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44(4), pp. 838~857.
- (28) Siggelkow, N., 2002, "Evolution toward Fi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47(1), pp. 125~159.
- (29) Singh, R., Mathiassen, L. & Mishra, A., 2015, "Organizational Path Constitution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Rural Telehealth", *MIS Quarterly*, Vol. 39(3), pp. 643~665.
- (30) Su, F. & Mao, J., 2013, "Client Influence on IT Outsourcing Vendors' Operational Capabilities: The Relationship Learning Perspective", in *Proceedings of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Jeju Island, June 2013.
- (31) Su, N., 2013,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 IT Service Suppliers", *MIS Quarterly*, Vol. 37(1), pp. 175~200.
- (32) Sydow, J., Schreyögg, G. & Koch, J., 2009, "Organizational Path Dependence: Opening the Black Box",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34(4), pp. 689~709.
- (33) Sydow, J., Windeler, A., Schubert, C. & Möllering, G., 2012, "Organizing R&D Consortia for Path Creation and Extension: The Case of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 33(7), pp. 907~936.
- (34) Tiberius, V., 2011, "Towards a 'Planned Path Emergence' View on Future Genesis",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Vol. 15(4), pp. 9~24.
- (35) Van de Ven, A. H. and Poole, M. S., 1995, "Explaining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Organization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0(3), pp. 510~540.
- (36) Vergne, J. P. & Durand, R., 2011, "The Path of Most Persistence: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Path Dependence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 32(3), pp. 365~382.
- (37) Wenzel, M., 2015,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abilization of Strategic Premises: How the Funeral Industry Buries Itself", *Business Research*, Vol. 8(2), pp. 265~299.
- (38) Wenzel, M., Wagner, H. T. & Koch, J., 2017, "The Funeral Industry and the Internet: On the Historical Emergence and Destabilization of Strategic Paths", *Europe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Vol. 26(4), pp. 361~378.
- (39) Yin, R. K., 2013,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Sage Publications, Inc.
- (40) Zheng, Y. & Abbott, P., 2013, "Moving up the Value Chain or Reconfiguring the Value Network? A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erspective on Born Global Outsourcing Vendors", in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The Netherlands.
- (41) 陈诚、毛基业:《企业战略选择的情绪基础:基于IT服务供应商的多案例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4期。
- (42) 李海东、林志扬:《组织结构变革中的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机制研究——以联想集团为例》,《管理学报》,2012年第8期。
- (43) 李健、吴飞同:《经济危机下企业技术创新路径演变模型——基于SECI模型的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年第8期。
- (44) 刘汉民、谷志文、康丽群:《国外路径依赖理论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4期。
- (45) 刘汉民、康丽群:《公司治理的路径演化和路径选择》,《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12期。
- (46) 苏芳、毛基业、谢卫红:《资源贫乏企业应对环境剧变的拼凑过程研究》,《管理世界》,2016年第8期。
- (47) 王凤彬、李彬、陶哲雄:《中国企业组织演变路径分析》,《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4期。

=====

(上接第159页)

- (16) 蒋辉:《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的模式与机制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 (17) 银马华、王群、杨兴柱、司新新:《区域旅游扶贫类型与模式研究——以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区36个县(市)为例》,《经济地理》,2018年第4期。
- (18) 张玉强、李祥:《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模式的比较研究——基于大别山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的实践》,《湖北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 (19) 张志敏、肖泽平、雷选标:《连片特困地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现状调查分析》,《教育与职业》,2018年第15期。
- (20) 郑长德、单德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时空演进》,《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 (21) 郑长德:《贫困陷阱、发展援助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1期。
- (22) 周常春、翟羽佳、车震宇:《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能力建设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11期。
- (23) Gien L., Taylor S., Barter K., Tiep, N., Mai, B., Lan, X., 2007, "Poverty Reduction by Improving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s in Vietnam", *Nursing & Health Sciences*, vol.9, pp.304~309.
- (24) Pade C., Mallinson B. and Lannon J., 2005, "Th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Investigation of Gender Specific Agricultural Developmen", *Afric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vol.17, pp.326~431.
- (25) Song Y., 2012,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The Contribution of Popularizing Primary Education",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1, pp.105~122.